拿什么抵御“伪阅读”

□ 吴　晞

英国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写道：“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我觉得对于我们今天的阅读来说也是这样，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好时代体现在大家都意识到文化和书籍的重要性，全国上上下下都在倡导全民阅读，读书风气初步养成。

坏时代表现在由于数字阅读的冲击，相当数量的人不读书或者极少读书，只在电子终端进行碎片化阅读。而很多以读书治学为主的知识分子，本来应该是真真正正的读书人，是读书的主体，但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急功近利、浅尝辄止，热衷于制造没有学术价值的垃圾，所以有专家提出了“伪阅读”概念。

什么是伪阅读？现在很多人不是在真正读书，而是在假读书，读假书。尤其对大部头的书、古文书、外文书不愿意下工夫，只想走捷径，浅尝辄止，或者只看零星的二手资料。比如属于明朝《三十六计》的“走为上”，却常常被认为是《孙子兵法》中的。貌似知道、貌似读过，实际上没有读过，就是我们所说的伪阅读的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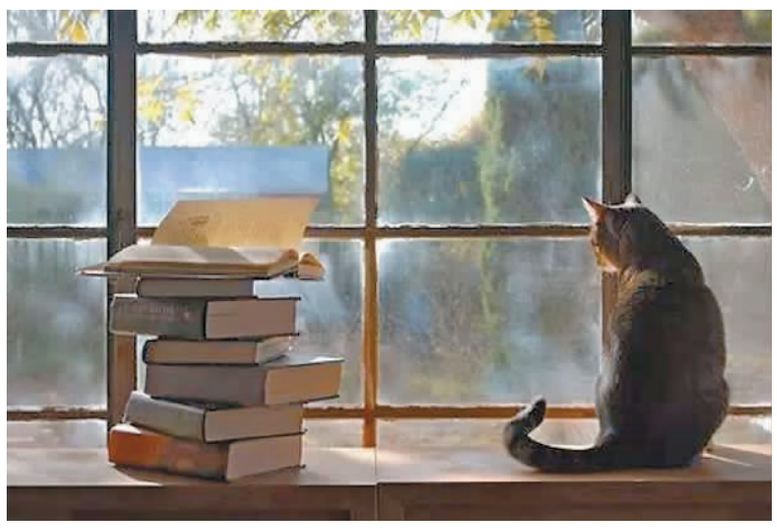
更深刻的危机还来自各种新技术的涌现及其在阅读领域的应用，读者阅读习惯在改变，社会信息渠道多样化，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困惑，这也是我们面临的共同问题。

如何面对阅读最好的时代和最坏的时代呢？用什么来抗衡伪阅读呢？我想讲三个问题。

第一，要大力提倡读原典、读原著，要读经典名作，这是我们阅读要遵循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有一位老师这么说：“读书一定要读原著，要了解佛教就要读几本佛经，要了解基督教就要读《圣经》，要想知道共产主义是怎么回事就要读《共产党宣言》。”

这些道理多数人明白，但是肯下工夫做的很少。很多年轻人以为看看电影《大话西游》就知道《西游记》了，提起鲁迅都能说两句，但是认真读过鲁迅原著的实际很少。我总说读原著是最简单、最容易的事情，鲁迅的小说不过就3本——《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杂文16本，你把它都读完了能花多长时间？可研究鲁迅的著作能放半个书房，你读一辈子都读不玩，其实里面大多数读了收益很少。

第二，要把各学科的精华变为广大读者可以接受的知识，做好学术的普及工作。比如我所学的图书馆学，本来是为了给读书人带来利益，可是它的专业性让行外的人很难理解，何况有的著作还故作高深和深奥，把本来明白的话说糊涂了。



我翻译过一本西方图书馆史，似乎评价不错。这几年我又写了3本书，希望用最通俗易懂、活泼生动的方式，让普通大众了解图书馆，乐于、善于利用图书馆。很多学科都有类似的情况，需要高手捅破这层窗户纸，让普通大众能够了解学术的内容，从中得到好处。

第三，要编制一流书目。中国目录学有很深的传统，有深厚的历史传承和文化内涵，利用书目给阅读提供指导也是传统中行之有效的方法。古人讲，目录之学读书文化之学也。

目录学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展现全部文献的目录，像国家书目、年度书目、图书馆基藏目录。这种目录以全为特征，展示我们全部文献的面貌。可现在几乎没有一部完整地反映国家出版物的书。

根据2014年《中国出版年鉴》我们国家的出版物一年有44万种——反映的是2013年的数字。这44万种都是什么？它具体的数目都有哪些？或者再缩小一点，比如文学，我们出版了哪些书？作者是谁？我没有找到具体的书单信息。

传统的书单有两种，一个是中国版本图书馆版的全国总书目，2004年到现在很多年都不再出纸质版了；一个是国家图书馆编的中国国家书目，1994年就停了。过去图书馆很热衷于搞基藏目录，现在从国家图书馆到各省级图书馆、各大学图书馆，都不再有人搞这个东西。现在我们只能看到新华书店出的科技新书目、社科新书目。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任何地方都查不到中国出版物全貌的书单，这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古代各朝各代都把书目当成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些东西要写入正史的。可是我们现在没有这个东西了，断档了。

第二类是推荐书目，和全民阅读的关联最大。推荐书目分为两种，一个是专题书目，一个是全面的阅读指导书目。据我所接触到的情况，专题性推荐书目靠谱的比较多，比如一个研究《诗经》的专家，会告诉你《诗经》哪个版本好，你入门应该读哪个，你解决某个问题应该重点参考哪个。

但是综合性的、全面的推荐书目好的极少。我甚至有一个极端的观点：自从100多年前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以来，就再没出现过一个全面的、得到各界认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书目指导。

我也曾经参加过所谓阅读书目指导的编写，后来再也不去了。我觉得书目不是这样编的，编书目的人揣摩潮流、揣摩领导意图，然后写出一份东西来。这个东西不要说读者不看，编者自己也不看，是极为不负责任的行为。

那么学问大家提供的书目怎么样呢？大家有一些见解是非常独到的，但是往往偏颇，不一定适合今天的读者读。一个最著名的例子，朱自清写过一本经典长谈，当然写得非常好、非常权威，但是它列举的第一本书，就是《说文解字》。他的理由非常清晰：你之所以读不懂古籍，之所以读错了，就是因为你不认识字，你把字搞清楚自然就读懂了，就不出错了。道理当然对，可是我觉得放在今天，像我这样水平的人要把《说文解字》真正翻懂没有几年不行，让普通人这样去做，恐怕是有问题的。胡适写过好几个关于史学的书目，但从不把《资治通鉴》放在书目里面去，他认为《资治通鉴》应该是给皇帝看的，史学中应该排除这个东西。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看，搞历史、搞中国史怎么能离开《资治通鉴》呢，这是他个人的偏见。

所以我呼吁图书馆界和出版界，应该下大力量，编出一本经得起历史考验，能够为民众所接受的，并且能体现我们整个学术水平、我们出版界水平以及我们图书馆界推荐阅读水平的书目。

（作者为中国图书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阅读推广委员会主任）

图书越大就越好吗？

□ 杨　葵（作家，编辑）

·读者之声·

书柜里的书越来越不整齐了。

从内容上说，早年文、史、哲三大类，再分一下古今中外，基本就解决了九成书的归属问题，一目了然。现在多出好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种类，比如食谱、动漫、琴谱、LP旅行手册，甚至还有收藏的各种漂亮的笔记本，不知道该往哪儿插放才恰当。这不仅证明个人眼界开阔了，趣味丰富了；也从侧面证明了图书出版业的繁荣，选题范围的开放延伸。是好事儿。

从形式上说，原来开本型态简单，大小32开，所以很容易码放得整齐划一；现在开本五花八门，异型开本越来越多，而且呈现一种越做越大的态势。这也证明了人们思想的开放，造纸、印刷工艺的提高，也应该是好事。不过对于这份好，我个人有保留意见。

意见是“过犹不及”。

技术层面上的大小没有问题，单看有没有必要做成那么大。如果确属内容所需，必须那样的形式配合，也没什么；但很多书之大，纯粹是为大而大，拢共十万字的小说，也印成16开，纯属赶时髦。再退一步说，赶时髦也没什么，问题是那些开本拿在手里，拿着不大舒服，为赶时髦而赶时髦就没什么意思了。

现在做书的人，可算明白了一件事儿叫“装帧设计”，本本书都可着劲儿往里头塞东西。单扉不行要环扉，环扉还嫌不够，再加衬，单衬不够还要环衬，腰封不够还要整体塑封，起鼓不够还要过油，过油不够再闷切，更别说那些页眉、插页、四色、双色、出血、跨页……直把书这么简单一个六面体做成外星人、钢铁侠、变形金刚似的，看得人头晕心悸。开本一事当然也在劫难逃，仗着纸业发达，出版人频繁奔赴造纸厂，订做各种刁钻古怪尺寸的纸张，大有SIZE（尺码）不惊人死不休的豪气。

且不提这些形式上的浮夸风，让读者多掏了多少腰包。也不提纸张源头是森林，如此浪费给生态资源造成多大浪费。单说开本大小本身，古人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所以有“文质彬彬”（文与质比例恰当）的说法。图书内容与形式二者之间的关系也一样。本该孜孜以求的，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把精力全都集中到开本大小这样的事情上，反而不去在内容上下功夫，舍本求末，挺扭曲的。这也从侧面说明了现在出版业的虚荣、泡沫。

当然，不光书业如此。这几天又过节了，到处都在卖礼品、送礼品。有关部门建议：规范各式商品包装，严格控制假大空行为。新闻配图是好几个酒的包装盒，偌大一个纸盒的比衬下，里头一瓶酒形同微雕。可见好大喜功、追求浮华外表已经蔚然成风。

说来也怪，现代人真是不嫌累，越是复杂的东西越感兴趣，而对那些简简单单、横平竖直的东西，就不爱待见。还是说回书的开本，大32开的开本存在了那么多年，无论视觉感观，还是拿在手中的感觉，都经过万亿人次的考验，为什么要像避瘟神一样见了就绕道而行呢？我可能有点顽固不化，始终坚持认为，图书开本一味求大，是图书垃圾化的前兆，更是人心不古的一个表征。

书香机关建设“北京模式”辐射全国

近日，北京阅读季·书香机关建设研讨会在京举行。研讨会由北京市委市直属机关工委会、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主办，商务印书馆承办。

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作为国家级阅读品牌活动，自2011年创立，已发展为首都文化建设的新名片和全国全民阅读的新典范。作为北京阅读季在机关中推广阅读的重要抓手，书香机关建设自2014年创立以来，从机关实际需要入手，围绕坚定文化自信、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带一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重大时代主题，着力阅读推广向基层延伸，开展了数百场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的机关青年读书大讲堂、“读我书庐”机关读书沙龙、机关亲子共读等品牌活动；推荐了多种机关阅读书单；培育了市委办公厅读书学会等机关阅读推广组织和阅读推广人队伍；搭建了以“公务员读书”微信公众号为核心的线上服务平台，营造良好读书氛围，丰富了机关干部的精神世界，初步形成了辐射全国的书香机关建设的“北京模式”。　（瑞　龙）

覆盖百所乡村学校『书路计划』

截至1月26日，中国扶贫基金会与亚马逊中国共同发起的创新公益项目“书路计划”受益的乡村小学达到110所，覆盖了包括贵州、云南、四川等8个省份，数万名乡村学生从中获益。

据调查，中西部贫困地区高达74%的乡村孩子1年阅读的课外读物不足10本，更有超过36%的孩子1年只读了不到3本书。超过71%的乡村家庭藏书不足10本，一本课外读物都没有的孩子占比接近20%。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丁亚冬表示：“‘扶智’不仅是中国目前扶贫攻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书路计划’的核心理念。”

“书路计划”目前已获得北汽集团、莱蒙基金等多家企业及社会爱心人士的捐助，同时得到了浙江数媒等出版社合作伙伴的大力支持。每一所Kindle电子图书馆都会配备50台Kindle Paperwhite电子书阅读器以及由出版社合作伙伴捐赠的500余本适合儿童阅读的电子书。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实地走访，自2015年“书路计划”发起以来，被资助学校70%受访儿童表示Kindle电子图书馆提升了他们整体的阅读量。为鼓励更多孩子爱上阅读和写作，每年都会面向“书路计划”资助学校举行小学生征文活动，到2017年已经成功举办第三届，优秀作品编制成的合集电子书《书路童行》受到社会关注。　（艳　梅）

凡书皆有图

□ 依　雁

有人认为现在已进入“读图时代”，书籍的彩色化、图片化成为国际出版的趋势。人们尝试在文字和图片间找到新的关系：它们是两个并行的信号系统，在“语言和文字的极限处让绘画和照片绽放光芒”。

其实，“古人以图书并称，凡书皆有图”。徐小蛮、王福康著的《中国古代插图史》（上海古籍出版社）追溯了中国古代书籍插图的悠久历史，让人了解到各个时代、各种形式、各种风格的书籍插图。

图书起源于简帛。在2000多年前的秦简《日书》上，就有一幅人形图，上面画着两个小人，另一幅是简单的方框图。竹简非常狭小，不适宜画图，所以画在简上的插图不多见。帛上的插图非常多，最著名的就是楚国的《帛书图像》，它比秦简《日书》的年代更久远。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使书籍插图从手绘进化到印刷。插图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上至经史通鉴、治国要略，下至天文地理、百科常识，包罗万象，可以作为启蒙读物、教化图说、形象纪录，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是一份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

明清时期，西方科学文化传入中国。西方绘画的透视法、明暗法运用到了中国书籍的插图中，于是插图有了远近和光影。新的印刷插图技术虽然使传统的雕版插图走向衰亡，但也使铜版插图和石印插图继往开来，加快了文明的脚步。

葛兆光先生说，图像“是历史中的人们绘制的，它必然蕴涵着某种有意识的选择、设计和构想”，其中就积累了历史和传统，古代书籍插图同样如此。

以史家之笔写杨绛“春秋”

□ 胡忠伟

近年来，江苏青年学人陆阳以研究乡邦文献为己任，从历史真相的挖掘与整理出发，痴迷于地方文史的写作，以一个现代人的眼光，以史家的睿智，去粗取精，去芜存真，先后出版了《无锡国专》《唐文治年谱》《薛剑明传》《胡氏三杰》《激荡岁月：锡商》等文史著作15部，校注整理各类著作5部350余万字，让读者触摸历史深处的烟云，为无锡地方文献的出版和繁荣作出了积极贡献，赢得了学界和文史爱好者的普遍赞誉，其著作多次荣获省市哲学科学奖和“太湖文学奖”。

继《江海揽胜》之后，他的写实性文史著作《杨家旧事：杨绛记忆之外的故事》（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隆重登场，该书深情讲述了杨家两代人的前尘往事，拨去历史的云烟和时代的尘埃，一位博学、睿智、淡定、从容、坚忍、善良的民国奇女子——杨绛向我们款款而来。

该书分为四部分，第一二部分别复原了杨绛父亲杨荫杭和姑母杨荫榆的生平，第三四部分则着重讲述了杨绛的读书时光以及与钱钟书一起在抗战岁月中所经历的人和事。在纷繁复杂的历史帷幕中，陆阳用自己的“史”的笔触和眼光，去还原那一段历史，给世人一个真实的“杨家旧事”，一个真实的杨绛。虽然，书中所写的事实可能不是最终的真相——历史往往有着重重面具，需要不断地揭开——但陆阳努力了，他努力“以史料为基准，记人叙事，在活画人物形象的同时，也致力描绘时代氛围，希望读者能从中细细体悟那一时代的丰富和驳杂”。应该说，这样的唯物史观和写作态度是真诚的，也是值得肯定和期待的。

提起杨绛，人们有更多的话要说。她陪伴钱钟书63年，他们一起比赛读书，比赛做学问，一起郊游，一起挨斗，他们的灵魂站在了完全平等的高度，相濡以沫，荣辱与共。在现实生活里，面对钱钟书的“幼稚和低能”，杨绛的“多才多艺和伟岸”，给了他们这个家最大的爱和力量，钱钟书曾深情地赞叹她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而杨绛的一生，却是那么坎坷，命运似乎要给她更多的考验。她的经历，是一个优秀的女性在那个时代的“不服输、不低头”的真切图景，令人唏嘘不已。

杨绛是无锡人，虽说是陆阳的乡贤，但她出生在北京，在无锡的生活不足一年。1922年，杨绛随全家迁往苏州，进入振华女校读书，1928年进入东吴大学。1932年，她从东吴大学到清华大学借读，在那里认识了钱钟书，结成了伴侣，相知相伴63年。杨绛深谙做人谦和、作文蕴藉之道，一生翻译了大量国外经典著作，也写下了许多回忆作品，这些怀人忆旧之作，往往避实就虚，含而不露，极有分寸，给读者留下了些许空白和疑问。从上世纪80年代的《干校六记》到其后的《将饮茶》和晚年的《我们仨》，杨绛用自己独特的文字，道出了一个世纪人生之路的冷暖炎凉，她以韵致淡雅之笔，描写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拥有着不蔓不枝的冷静和从容。她深爱着英国诗人蓝德的一句诗“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那种人淡如菊的心境和文人铮铮傲骨，令人钦敬感佩。

陆阳从看似纷繁复杂的材料中，剥丝抽茧，拨云见日，爬剔搜罗，一一还原，见他人之不能见，言他人之不能言，在史料的整理和发掘上，用功用力探寻出了历史风烟深处的真相，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有了新的探索。以第三部分“杨绛：读书时光”为例，从幼年季康（杨绛1911年7月17日出生于北京，在家排行第四，取名季康）在大王庙小学读书的情景写起，直到在东吴大学“闹学潮”，再到后来与钱钟书见面、定情、留学，由点及面，以细节胜，完整勾勒了杨绛的成长、成才，求学、成名的历程以及她与钱钟书的相遇、相爱和相守，一个智慧的奇女子的形象呼之欲出、跃然纸上，足可见证陆阳作为一个文史专家的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史学积累。没有一定的驾驭史料和结撰文史的能力，这样的史传断难写出。我以为，陆阳的《杨家旧事：杨绛记忆之外的故事》是以史家之笔写出的杨绛“春秋”，处处闪耀着史家之笔的严谨、务实、理性之光，整部书文笔通畅，语言平实，简洁易读，是一部好看、有趣的文史佳作。

杨绛（左）与钱钟书年轻时